

「移地研究」經驗的分享

鄭凱元*

國科會《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來信邀請我分享關於「移地研究」的經驗，我沒有把這個有點苦的差事推掉，因為我好像確實在過去幾年來申請了好幾個補助移地研究的經費，並從中獲得相當實質的助益，覺得有義務接下此工作，藉撰寫分享經驗的機會謝謝國科會與相關單位的補助，並呼籲類似的機制應持續存在，讓臺灣的學術水平得以持續提升。

移地研究大致可分兩類：一是移地在國內的不同單位進行研究，二是移地至國外相關學術單位進行研究。國科會與其所屬的人文學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最近已合併為人社中心），以及中央研究院或教育部及其他單位，對這兩項均有各種不同的補助機制，有些是補助一個暑期大約 2 至 3 個月的移地研究，有些是半年或一年不等的移地研究。另外有些則是配套在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裡所編列的預算裡執行，移地進行為期通常是一週至二週，但也可能更長時間的資料蒐集或與學者深入合作或訪談等工作，讀者可詳加調查並視自身需求提出申請。以下筆者將就本人在這兩類的申請及執行過程來做一些甘苦談，希望能提供一些值得參考的經驗與訊息。

一、移地研究：國內篇（I）

筆者第一次進行移地研究是在國內，在 2006 年時，我申請了由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所補助為期一年的「年輕學者學術輔導與諮詢補助」計畫（請參考國科會《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年輕學者學術輔導與諮詢之申請與執行經驗分享」，第九卷第四期，2008），於學期中每隔二至三星期往返於那時所任教的嘉義縣中正大學與臺北市間，與任教於東吳大學的薪傳學者林正弘教授定期碰面討論。在執行期間，考慮到暑假時期學校不用授課，若能移地在臺北就近與薪傳學者做更密切的討論，並就近利用在中研院與臺大豐富的藏書與資源做更深入的研究，應會是較有效率的作法。因此，在詢問承辦

* 陽明大學心智哲學所教授



人員確認可行性後，撰寫了一個與薪傳學者計畫相關、屬於延伸性議題的計畫書，備妥相關的文件申請至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於2007年擔任該中心的訪問學者，進行暑期研究。國科會人文學中心位於臺大總校區，那時由於人文中心空間有限，因此中心將筆者與另一位訪問學者安排在同一間研究室，他是目前任教於臺師大國文系的劉滄龍教授，記得那時候還對彼此的研究——尼采與語言哲學——有隨興而愉快的對談與交流，直到今天也在中國哲學的一些議題上，持續有學術上的交會與合作。這樣的機緣在移地研究所能帶來的樂趣與收穫中，佔很大的一部分。

在人文中心的研究完成後，中心也安排了一個來訪人員的集體成果發表會。這樣的場合除了可以蒐集各方對自己研究的批評與建議，也是一個學習別人的研究領域與拓展研究視域的好機會，更不用說是一個學術上的義務，因此對於在結束短訪後，能有給一個學術演講的機會，我通常是非常的珍惜。此次的移地研究除了讓我將兩篇草稿專心改完投稿後（後續均陸續發表於國際期刊），也有機會形成新的問題意識。移地研究的主題則是關於科學哲學裡的「其他條件均相等」定律（*ceteris paribus laws*）的語意問題，對這個主題的深入研究將我的焦點轉到一般類詞學（*generics*）的研究。該研究處理沒有外顯的量化詞，但卻做出容許反例的普遍性宣稱的語句，例如“Birds fly.”、“Sharks attack.”、“Mary walks to work.”等等，邏輯哲學與語言學等相關學界對於其內在的量化結構與真值條件深感困惑，並在近年來投入相當多的心力探索此問題。我發現對此問題的處理可延伸至對科學哲學裡的「其他條件均相等」定律、語言哲學裡的規則依循，以及形上學的傾向等課題的探討，而這方面的研究資源在中研院歐美所是最豐富的。由於結合這些面向來處理不同領域的問題是相當前沿的嘗試，若能做得出來，應該會有一些不一樣的突破，這意味著我又得要再申請短訪了。後來在教學之暇準備相關資料，並於2008年暑期再度到臺北進行移地研究。

中研院在支助國內學者到該院進行短期研究方面相當有制度，一年至少要有兩次的時程可申請至該院進行短期研究。程序上是先確定你要到哪個所做研究，再看你跟該所哪位研究員的領域方向最接近，先行詢問該位研究員是否願意支持你至該所做短期研究，若願意的話，他（她）得幫你寫一封表達支持意願的短信在你的申請表格上，你再填妥相關的文件向法院方提出申請，申請文件包含一份你所預定進行的研究計畫書。這份計畫書不用太長，大約

5 頁左右，簡單清楚地交代你過去的研究方向與成果，預計進行的研究議題與內容，至該所進行短期研究會對你的研究有何幫助（除了說明將利用其圖書資訊等資源外，別忘了提及和你的研究有直接或間接相關的該所研究員對你的研究可能有的助益），預計產出的成果等等。若你和預定支持你進行研究的該院研究員不認識或不熟，我的建議是先將完整的學術履歷表與撰寫好的計畫書初稿寄給他（她）參考，並附上一封文情懇切的信，重點是讓對方相信你的訓練背景良好，對學術研究充滿熱誠，將要進行的研究計畫有高度的重要性與迫切性，你會在停留期間扎實地做研究等等。若能得到其支持信，那移地研究的申請案大概就有比較高的機會通過了。由於我和支持者方萬全教授領域相近，平時在許多研討會及相關學術場合就有互動的機會，因此在聯繫上頗為順利，就成行了。

在移地短訪的三個月裡，我會利用一些午餐或茶敘的機會和相關的研究員請益研究上的問題，和研究領域相關的方萬全，鄧育仁與何志青等教授們交換意見的過程裡，均能得到啟發與幫助。這些學界的前輩與友人有時也會依據你的研究興趣，適時地引介你去參加一些既有趣又前沿的學術工作坊或演講，比如我就在短訪期間參加該院一個人類學跨領域、以身體為主題的工作坊，對於拓展研究視野相當有幫助。且該單位所舉辦的演講常邀請各個領域的國內外學者，報告其最新成果，那也是吸取新知，順便喝一杯咖啡和其他研究員或訪問學者閒聊幾句的好機會，有時還可交換一些訊息。例如，就有一位外文領域的學者跟我大力推薦歐巴馬在上次競選美國總統時的一篇關於種族主義的講稿，並寄來給我看，我也因此閱讀了平常不會主動注意到的題材與文獻，而這些激盪都很寶貴，使我的視野不至於因為長期過度專業的研究而狹隘。

同樣的道理，在短訪期間也可充分利用地利之便，與在周邊學術單位的學者互動。由於我在語言哲學方面的研究和臺大語言所蘇以文教授從認知語用學的進路研究語言有所交會，一直以來都有保持研究上的聯繫，也因在臺北短訪而有較多的機會討論。其中一個我們共同關切的課題是：在高度專業化領域裡的學科，例如科學，會出現像「其他條件均相等」的防避詞（hedging expressions），來保護科學定律不受反例的威脅，這些防避詞和在日常生活中出現的防避詞，例如「原則上」（in principle）、「可能地」（possibly）等字眼，是否有共通連續之處？這些詞的使用者背後是否有共通的心理機制與社會因



素在決定其使用模式？由於這些問題相當值得開發，所以在一個機會下，蘇教授邀請我前去臺大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申請擔任短期研究學者，繼續研究這個課題。

於是在中研院的最後一星期，又在寫 5 頁的計畫書，之後在同年 10 至 12 月，再到臺大進行為期三個月的短期研究。不過因為已經是學期中，所以沒有移地研究，只有不定期地北上利用臺大的圖書資源，並持續與蘇教授討論。後來我們共同撰寫的論文：“From Subjectification to Intersubjectification: A Cognitive-Pragmatic Analysis of Hedging Expression”，很榮幸地收錄在《語言與認知：戴浩一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裡 (*Language and cognition: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James H-Y. Tai on his 70th birthday*, Editors: Jung-hsing Chang and Jenny Yichun Kuo, Publisher: The Crane Publishing, Taipei, 2011.)。在短訪期間也受黃俊傑院長之邀，希望我能在東亞文明研究期刊貢獻書評一篇。一來這是在中文學界很好的期刊，二來也爲了要答謝黃院長接受我到該院當訪問學者，因此我就先應允，至於要寫哪本書，腦中一片空白，心想要讀的書那麼多，之後再慢慢想辦法找一本最合適的來寫。

在中研院歐美所移地研究期間的成果，是撰寫了一篇將語言學裡關於 *generics* 的研究應用到哲學上關於規則依循討論的草稿，我對這篇論文的創新性有些信心，覺得應該可以試試很好的國際期刊，但評估一下要真能刊上還需要進一階的琢磨。由於我在文中對 *generics* 採取的認知進路是參考在普林斯頓大學哲學系與心理系任教的年輕學者 Sarah-Jane Leslie 教授所提出，而該校哲學系又是規則依循哲學論述在某個意義上的起源地（曾在該校哲學系任教多年的哲學天才 Saul Kripke 是將維根斯坦對規則依循的討論帶到高峰的主要人物，後來傳聞因其難搞的脾氣與性格惹出不少麻煩而提早退休轉至紐約市立大學哲學所任教）；再者，我那時正在著手研究的傾向 (*dispositions*) 課題，在該系也有非常核心的學者在處理，包括講座教授 Mark Johnston 與 Michael Fara 等等，因此當下決定 Princeton 應該是我要去把這篇草稿磨出來的地方。

由於我那時擔任教職已將屆滿六年且剛升等爲副教授，按照哲學界良好的慣例應該出去再充電一番，於是我就著手申請國科會短期出國研究的補助出去半年。在出國程序上有三件事得做：(1) 跟工作單位確認在預定出去的時間點可以出去，(2) 跟國外可能願意支持你至該單位進行短訪的學者聯繫，

說明你的意願及你將會申請國家的研究補助出去，(3) 跟國科會提出申請。在聯繫學者方面，由於 Leslie 教授是年輕學者，因此我選擇找資深的 Johnston 教授當我的移地研究的支持者，因為這種申請案通常得在該機構的行政會議通過，若能有資深的學者直接支持，一般而言較易通過。我和 Johnston 教授完全不熟，只是恰好在當博士生時跨校在紐約大學修 Thomas Nagel 與 Ned Block 兩位教授的專題研究課程「意識」時，有機會在課堂上聽過他深刻而精彩的演講，並和他在演講前聊過兩句。因此就依之前所提的交戰守則：準備了學術履歷及撰寫好的計畫書寄給他，並附上一封文情懇切的信。大概感受到我對學術的熱誠，Johnston 教授 24 小時內就回信並應允，我便於 2009 年春季前往美國進行為期半年的移地研究。

二、移地研究：國外篇

到國外移地研究的相關文件與程序較為繁複，包含健康旅遊保險，適當種類的簽證等等，往往都得大費周章地辦理，申請案在校內也須獲得系、院及校級相關行政程序的許可，有意的申請者需要預留較多的時間去跑完這些程序。在國外有半年的時間，在時間上較為完整，因此在停留期間除了進行預定的研究及出席不定期的學術演講及工作坊外，也可以旁聽一些和研究相關或有興趣的課程。也由於美國許多大學環境都不錯，在這些地方移地研究是一個重新歸零，調節步伐的好時機。

在短訪期間，Leslie 教授在研究所開設 generics 課程，我剛好可以學最新的東西，並用到我的研究上，學期中和她有多次的討論，並將我在臺灣寫的草稿給她看，尋求意見。這篇文章在歷經幾次的討論修改後，我將較完整的版本寄給七八位和這個議題有高度相關的學者看，多數我不認識，但我在署名上有附上是普林斯頓大學的訪問學者，這可能大大沖淡我在他們印象中僅是路人甲的身分，後來有四五位給我回應及意見（此比例是本人的歷史性新高）。其中一位我從沒碰過面的著名學者給我四頁滿滿的建設性建議，甚至還幫我改了些英文，帶著萬分感激的心情又花了大量的力氣依照這些建議修改完文章，我知道這文章終於可以投稿了，而且應該可以被很不錯的期刊接受，後來果然在第一輪的投稿就被接受了。這篇文章歷經三個計畫的補助（國科會人文學中心、中研院、國科會）才孵出來，不知道是屬於順產還是難產，但結果總算對國家有些交代。



另外和我的接待學者 Johnston 教授也在抵達後不久就約時間吃飯，當面謝謝他，並送他一盒正港的臺灣鳳梨酥，感謝他的慷慨支持，這樣禮輕情意重的表達在國際上應是屬於合情合宜的表現，又可宣傳臺灣的美食，一舉數得。他跟我說他這學期開的課是「宗教哲學」，裡面主要是講授他正在完成的兩本書稿：*Saving God* 跟 *Surviving Death*（很炫的書名），並說這可能不是我所期待的，我連忙說我一定會去聽（雖然心裡完全沒預期要聽這樣的課），後來證實這門課即將把我的學術旅途帶到一個的美麗的插曲（或許以後有一天變主題曲也說不定）。話說 Johnston 教授是在西方一神論的脈絡下論述關於上帝與救贖，自我與人的同一性之哲學課題，然而在一次窗外大雪紛飛的課堂上，我突然頓悟小時候聽過但從沒懂過的莊周夢蝶在說什麼，下課後火速衝到圖書館借出莊子文本，令人慚愧的是，這是我在有生之年第一次讀其文本，還好 Princeton 有這本書。帶著微微發抖的雙手，發現在「齊物論」裡內藏一個論述關於自我本質為何的困惑，而出現在此章最後兩行的莊周夢蝶文段乃是為此困惑提出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解答。我再花了兩星期蒐集並閱讀過去三十年來英美學界對莊周夢蝶的解讀，發現我的解讀和大家的都不一樣。我的內心相當欣喜激動，彷彿自己近二十年來學西方哲學就是為了這一刻。我跟 Johnston 教授提及此發現，認為他的哲學靈感和莊子極為神似，並開玩笑地說他可能是莊子轉世，Johnston 教授對這樣的稱讚接受度很高，反應很快地說他的名字念起來似乎也像莊子，鼓勵我將此論點寫出來。於是我之後又開始寫 5 頁的計畫。同時，也針對極具原創力的 *Saving God* 一書，認真地撰寫了長達 15 頁的書稿，投給了東亞文明研究期刊，經審稿後刊登（〈書評：《拯救上帝：去除偶像崇拜後的宗教》〉（*Saving God: Religion after Idolatry*, by Mark Johns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七卷第一期，2010），回應了對黃院長的承諾，也藉此對 Johnston 教授表達謝意。

這段期間我也常和來自巴西及明尼蘇打大學的訪問學者一起討論哲學與喝啤酒，後來巴西學者邀請我到巴西一個不錯的科學哲學與科學史期刊投稿。由於我正好有一篇在臺灣與國際學會報告過的文章正在修改，討論關於其他條件均相等定律的語意及認識論問題，主題合適，想到巴西也是大國，若哪天臺灣因少子化問題而導致我被裁員，履歷日後也可往巴西丟。後來就將此稿投至該期刊，並在匿名審查後獲得刊登（“How (Not) to Give a Semantic Analysis of *Ceteris Paribus* Laws”, *Cadernos De Historia E Filosofia Da Ciencia*,

Serie 3, v. 18, n. 1: 173-195, 2008: Jan-Jun.)。出版後看著巴西朋友幫我寫的葡萄牙文摘要，感覺相當美妙，但同時內心其實很清楚自己與臺灣學界對巴西哲學界並不十分熟悉，所以日後若要升等，這篇文章不易算點數，爲了避免麻煩，屆時就列爲參考著作，且就把這篇文章當作是一個與南美學術圈的往來與交流吧。

除了聽 Leslie 與 Johnston 兩位教授的課外，我因爲想補一些邏輯方面的背景知識，就近（搭火車約一個小時）回母校——紐約市立大學——旁聽傑出教授 Rohit Parikh 的 Epistemic Logic 課程。母校的邏輯 program 世界排行第一，第二是 Stanford 大學，這意味著我課跟得很辛苦，但以校友及已進階爲教授而不再是學生的身分和 Parikh 及一些老師例如 David Rosenthal 敘舊，可以聊到比較不同的面向，收穫無可比擬。在一次和 Parikh 教授課後喝咖啡時，他談到一位知名的哲學同事，認爲自我與人的同一性問題是始於十七世紀的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而在這之前此議題在人類思想史上是一片空白。Parikh 是印度裔，對於西方白人同事的無知相當震撼與不快，因爲早在兩千多年前，佛陀就以驚人的深度探討自我的本質。由於文化的相近，我毫不費力地呼應著 Parikh 教授的感受與觀點，並將莊子也加碼上去。當天 Parikh 教授便提議並邀請我在紐約合辦一個東西哲學會議，扭轉美國分析哲學界裡潛藏之文化偏見。之後的幾個月裡，我們便投入會議的籌備與經費的籌措，連袂拜會了紐約市立大學的教務長、研發長、哲學系主任，以及普林斯頓哲學系的前後任系主任 Mark Johnston 與 Daniel Garber 等等，四處爭取經費與支持，最後敲定在當年年底於紐約市舉行【Conference on Eastern and Western Philosophical Themes】（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Graduate Center, December 4-5, 2009）。除了順利邀請到主流學界裡的 Galen Strawson、Akeel Bilgrami、Mark Johnston、Graham Priest 等等十多位重量級哲學學者擔任主講人，也吸引上百位聽眾的參與，其中多數是分析哲學的學者與研究生，這在亞洲哲學課程與師資往往被放置在東亞系或宗教系裡的美國而言，意義不凡。藉由這個過程，我看到這塊領域在英美以分析哲學爲主的學界有很大的拓展空間。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我在 Leslie 教授的課堂裡有位心理系博士生是著名心理學家 Philip Johnson-Laird 的學生，我和該生平常有很多討論，Parikh 教授因此透過我邀請 Johnson-Laird 到其邏輯研究團隊去演講。透過這些互



動，Johnson-Laird 教授也開口邀請我到他和 Sam Gluckberg 及 Adele Goldberg 教授的聯合實驗室演講。對於這種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我都是把握一個原則：先答應再說。八月底結束半年的研究返臺後，較為充分地準備了與蘇以文教授合作的成果並徵求蘇教授的同意，於十二月初至紐約主辦東西哲學會議時，順道到 Princeton 心理系演講，報告我們部分的研究成果，充分獲益於三位心理學與語言學教授及多位研究生的回饋與討論，也為美國的移地研究，劃下愉快的句點。

三、移地研究：國內篇（II）

忙完紐約的行程後，我得為 5 頁的莊周夢蝶計畫書找出路，我從來沒有這麼想要把一篇東西寫出來過，心想一定要找一個專業的地方執行此計畫。此時，腦海浮現的是中研院的中國文哲所的李明輝教授，和他在工作坊有幾面之緣，但幾乎完全不熟。在莊子的驅動下，硬著頭皮寫了一封文情懇切的信給這位資深傑出的教授，說明我有一個重要而迫切的研究得在他們所做。不到 24 小時，李教授回信說：「凱元兄，我現在人在德國。雖然我做儒學，不做莊子，但樂意支持你的研究，你可和所內其他有做莊子的同事，例如何乏筆，黃冠閔，鍾振宇等等討論…。」幾個月後，帶著萬分感激的心情，我又移地在文哲所扎扎實實地做了近三個月的暑期研究，將文章寫了出來，並在文哲所做了演講，接受了許多專家嚴格而實質的批評。之後，又在政大的一個會議報告，廣納建言，在陸續獲得一些學者給我重要的意見後，將文稿修改並投稿，最近被此領域最具歷史與權威之一的英美期刊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接受。若沒有移地研究的補助機制，這個研究產出只怕會事倍功半。

四、結語

學術研究在拿到博士學位後，似乎只是個開始，處在隨時挑戰自己思考的極限與尋求突破的壓力，顯然是多數學術人的生活常態。而移地研究在這樣的過程裡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調節機制，它可讓你轉換心境，跳脫原來的工作環境，獲取新的養分與刺激，也可在一個新環境拓展學術上新的連結，直接或間接促成腦袋升級，成效宏大。建議大家多多善用移地研究的資源與補助，雖然往往要在住宿與生活的開銷上自己貼錢，也要承擔許多到新地方可能會有的風險，更需要家人的支持，但還是值得。祝大家好運！